

流行世界

LIUXING
SHIJIE



■动荡节拍 /白岩松/著

中国流行音乐风云榜

■聪明糊涂心 /刘晓明 赵宏宇

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

■独坐墙角的滋味

28种人生极境的素描

■爱的独白 /青鸟

一位少女的柔声自诉

■不再辉煌 /林天/著

年代世界足坛铁幕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流行世界

LIUXING
SHIJIE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长春

(吉) 新登字 12 号

流行世界
LIUXING SHIJIE

责任编辑：唐峻山 侯文富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王 慧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10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 印数：0 001—8 000 册

ISBN 7-5602-1035-X/I·54 定价：5.50 元

目 录

LIUXING SHIJIE

□动荡节拍 /白岩松/著

中国流行音乐风云榜

□聪明糊涂心 /刘晓明 赵宏宇

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

□独坐墙角的滋味

28种人生极境的素描

□爱的独白 /青 鸟

一位少女的柔声自诉

□不再辉煌 /林 天/著

80年代世界足坛铁幕

流行世界

目 录

LIUXING SHIJIE

□动荡节拍 / 白岩松 著

中国流行音乐风云榜

□聪明糊涂心 / 刘晓明 赵宏宇

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

□独坐墙角的滋味

28 种人生极境的素描

□爱的独白 / 青鸟

一位少女的柔声自诉

□不再辉煌 / 林天 著

80 年代世界足坛铁幕

动荡节拍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

风云榜

白岩松/著

流行世界

□从零开始：流行音乐活力四射□潮来潮往：却道今不如昔□乘虚而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盛名之下：港台有实难负□风霜雪雨：摇滚乐突飞猛进□急功近利：盗版日渐猖獗□唯我独尊：找寻自己的创作□流行音乐：重新计划现在

王 珩/漫画插图

从零开始：流行音乐活力四射

从《小城故事》到《乡恋》，初起步的流行音乐在大陆就像一支孩童手中的万花筒，变化出千奇百怪的色彩。为此，习惯了平静的人们以各种目光，出发于不同的角落，纷纷评说。

70年代末，对于刚刚从恶梦中苏醒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摇摇摆摆的年代。改革开放，使阻挡在中国百姓面前的高墙轰然坍塌。世界以它本来的缤纷色彩呈现出来，令麻木了很久的中国人为之惊奇、为之诧异。

当喇叭裤、大背头、砖头式录音机、邓丽君做为“资本主义”第一代“文化入侵者”行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时，人们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一时间，高兴、生气、悲伤、愤恨……各种情绪倾泻而出。但没过几年，喇叭裤、大背头便由于服装流行趋势的变化和中国人审美眼光的变迁悄然地消失无踪了。然而，以砖头式录音机和邓丽君为起步的流行音乐却在大陆从私下到公开，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到大多数人的消费品，曲曲折折地一路走来，慢慢演化成社会文化的一个强大分支，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最早的邓丽君歌声，让人首先感到的是新奇，已经听惯了高亢激昂的耳朵迅速在邓丽君的柔

和声线里发现了心灵的绿洲。在“文化沙漠”年代中生活了十几年的中国百姓，以饥渴的心情使邓丽君、刘文正迅速在人群中扩散开来。不过，这时候中国百姓接触流行音乐还有一种偷吃禁果的感觉。报刊、杂志不时会出现声讨、批评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的文章，斥之为“黄色的东西”、“靡靡之音”、“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特有产物”。

然而，邓丽君屡禁不绝。可以说，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邓丽君、刘文正这些港台歌手以人们无法抗拒的新奇和全新的感染力，培养了大陆庞大的流行歌迷群体；同时，也使闭塞很久的中国音乐界感受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冲击；而大陆一些热爱流行音乐的年轻人，在听邓丽君、刘文正的同时，慢慢以摹仿的方式缩短着自己和流行音乐之间的距

离，为以后涌现出大批流行歌手奠定了技术基础，这其中包括赵莉、朱晓琳、程琳等一批拓荒歌手。

就在大陆音乐界、新闻界纷纷扬扬对邓丽君展开争论和评判的时候，中国音乐圈突然“后院着火”，为这场是“靡靡之音”还是“艺术”的争论制造了新的新闻由头。

1979年底，权威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电视专题片《三峡传说》，这部片子本身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然而作为这部电视专题片的主题歌，却在音乐界乃至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失/今天却又和你相逢……”

这首《乡恋》由马靖华作词，张丕基作曲，由当时大陆最走红的女歌唱家李谷一演唱。歌曲运用了电声乐队伴奏，旋律优美，词意清新。然而，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在于歌曲本身，而在于李谷一



《乡恋》带给李谷一的，并不都是麻烦。

在演唱这首歌时运用了气声唱法，让人很快便联想到港台流行歌曲。首先对此表示批评态度的观念大致为：“放弃自己民族的东西，向港台庸俗文化靠拢”；“演唱风格低下”；“港台怎么唱我们不管也管不着，但是我们这个一向有优良艺术传统的国度，绝不应当出现这种‘下流的东西’”。如果说，以上这些观念还有些“艺术”的味道，那么“崇洋媚外”、“是不是党培养了多年的音乐工作者”、“亡党亡国的前奏曲”等指责，在今天看来，便是忧虑之心过于沉重了。

几年之后，人们便已经习惯于把《乡恋》看作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第一首成功之作。事实上，正是由此，大陆的创作者才开始投身于流行音乐这种全新艺术形式的创作之中，也正是由此大陆的流行音乐才开始努力摆脱港台的阴影，在自己的道路上蹒跚起步。

从《军港之夜》到《夜色阑珊》，流行音乐在依旧的众说纷纭中壮大着自己。走自己的路与“他山之石来攻玉”并存。

随着对邓丽君、对《乡恋》争论的纷乱无绪，和最后的不了了之，流行音乐在大陆摇摇晃晃地站稳了脚跟，开始了生长的过程。

1980年，北京举办了一次“新星新秀音乐会”，这场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音乐会，向社会展示了大陆流行音乐的最初创作成果，并推出苏小明、朱明瑛、郑绪岚等一批歌手，让歌迷们知道，除

了邓丽君等港台歌手以外，流行音乐中还有我们自己的名字。在这场音乐会留下的一张像片上，站在歌手最中间的是苏小明。随着《军港之夜》、《幸福不是毛毛雨》等歌曲的大范围传唱，苏小明成为那个年代最走红的歌手，在大都市几乎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并拥有了自己大量的狂热歌迷，使歌坛明星崇拜第一次在大陆成为现实。

1980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编辑部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十五首”评选活动，入选的十五首歌曲展示了大陆创作者的初步实力。

入选的作品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响》、《太阳岛上》、《我们的明天比蜜甜》、《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等，这十五首歌由于完全是群众投票评选，因而代表了那时人们的欣赏口味。

《中国文艺年鉴》归纳1980年乐坛争论的三个问题中，包括对十五首获奖广播歌曲的争论。另两个争论为，一是关于流行歌曲，二是关于“何日君再来”，可以说争论全部集中在流行音乐上。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十五首歌没有时代的特点，越听越软，向“流行歌曲”靠近，反映了创作的一种倾向。

这场争论最后以有关领导的“总体肯定”宣告结束，但仍然指出了此次评选的缺点，没有采取群众、专家、领导三结合的方式。

争论很快过去，80年代初，中国歌坛呈现活跃的景象。那个时期最流行的歌曲包括三种：一是港台爱情歌曲；二是以《赤足走

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为代表的台湾校园歌曲；三是以十五首获奖歌曲为代表的我国首创歌曲。流行音乐已经开始深入人心。

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流行音乐还基本停留在“史前状态”。这种“史前状态”主要表现为歌词白话直露，没有多少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口号式、赞美式的歌词不绝于耳，离人们的距离依旧很远。此外，从对比的角度来说，大陆歌曲的自创性依然很弱，除了苏小明《军港之夜》、周峰《等到明年这一天》等歌曲之外，占据大陆流行乐坛的主要是刘文正和邓丽君的歌曲。从专辑推出的质量来说，大陆还刚刚起步，歌曲的配器单调简单，少层次，录音技术粗糙。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时期的歌手素质参差不齐，高的实际属于艺术家的范畴，而低的连乐谱都不识。很多人是以摹仿邓丽君起家的，本人所受的训练很少，唯一的老师就是“砖头式”录音机。这种歌手，只能在介绍港台作品中走的很远，而无法为歌迷带来自己的东西。

此时的大陆流行音乐，并没有被社会当做一种艺术形式来看待。但是，这段“史前状态”时期，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

在理论上，争论使流行音乐“合法化”，对邓丽君、李谷一《乡恋》的争论过后，苏小明、程琳又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评判，她们俩人是否出面竟成了测试政策的晴雨表。直至1984年，仍有大陆音乐杂志对台湾罗大佑《童年》这首歌展开争论。这以后，社会上仍有人对“流行音乐在大陆蔓延”表示出焦虑的心情。这一切，都流露出

那个年代对新事物接受的难度。

就音乐本身来看，这个时期大量介绍了外部作品，无论是台湾还是欧美的流行音乐，都通过各种媒介出现在大陆歌迷的面前。像周峰在80年代中期推出《眼之魅》专辑，就收录了当时正流行于欧洲的劲歌《我爱肖邦》和风行美国的《哈罗》等曲目。同时，大陆音像界通过“扒带”的方式把域外流行曲目大量呈现在“贫穷”的歌迷面前，也使大陆流行音乐工作者在借鉴中提高着自己对流行音乐的认识。

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改革蓬勃开展，中国一年一个面貌出现在世界的面前。改革开放，使国外流行音乐的发展程度，被大陆音乐青年得知，迈克尔·杰克逊、莱昂内尔·里奇、乔治·布什、迪伦、滚石、披头士、摇滚、重金属、迪斯科、布鲁斯，这些过去人们闻所未闻的名字，让歌迷不再陌生，一些新人、新的音乐形式，开始为流行音乐在中国发生质的变化，而做着音乐和人员上的准备。

他们正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把流行音乐在大陆提升到一个新水准的时机。

从《我们是世界》到《让世界充满爱》，借助世界和平年的圣洁，中国流行音乐以积极的正面形象站立在国人的面前。当歌手齐声高唱《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社会终于伸出双手，以一颗爱心拥抱了流行音乐这个新生儿。

美国，1985年1月28日黄昏时分的洛杉矶，这是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夜晚。

晚上9时，全美国40余名最有声望的歌星聚集在一间大录音棚里，他们要进行一次空前的合作录制一张唱片作为援非募捐。这张唱片就是后来风靡全世界的《WE ARE THE WORLD》，即《我们是世界》。

这些蜚声世界的歌坛巨星，包括迈克尔·杰克逊、昆西·琼斯、保罗·西蒙、肯尼·罗杰斯、莱昂内尔·里奇等46人，每个人都拥有众多如醉如狂的听众，但他们之间，除了在比赛中同台角逐以外，彼此很少来往，更不会合作演出。而今，非洲遭受的这一场巨大灾难，却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是世界》是这次援非义演的主题歌，作者是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由迈克尔·杰克逊这位世界流行乐坛的天皇巨星，在这首由40多人轮番演唱的援非主题歌中担任领唱。

1985年4月5日，星期五，是为非洲赈灾的高潮。这一天，世

界各地有8000多个电台同时播放了这首歌。《我们是世界》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

中国流行音乐工作者同样在《我们是世界》圣洁而宏大的气势中感受到自身的责任。没过多久，台湾流行音乐奇才罗大佑作词作曲创作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汇集台湾三四十位歌手合力推出，这首歌迅速在大陆广为传唱，进一步刺激了大陆流行音乐界。

当时在社会上知名度成上升趋势的作曲者郭峰，和另外两名好友产生了办一场音乐会的念头。经过紧张的思考和碰撞，一个由大陆百名红歌星参加的大型音乐会，终于在理论上成型。

1986年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和平年”。无疑，这是一个由头，音乐会决定献给“世界和平年”。

准备从两方面开始着手。一是主题歌的创作，一是百名歌手的寻找。

主题歌由陈哲和郭峰等人联手推出，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经过歌手们的检阅后顺利通过。而寻找歌手采用了串糖葫芦的方

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使中国流行音乐树立起正面的形象，但那圣洁的歌声，也使郭峰的知名度达到了巅峰状态。



法，一个歌手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百名歌手迅速凑齐。

这台音乐会由中国录音录像公司与东方歌舞团合办。

1986年5月9日，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工人体育馆做为演出地点成为当日北京的热点。流行音乐迷似乎意识到这台演出的价值，距离演出时间尚早，工人体育馆已被歌迷“包围”，有些人手中拿着钞票，希望幸运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或许有人退票？

演出开始了。“想起来是那么遥远……”随着歌声第一句的传出，全场掌声四起，一双双激动的眼睛盯在体育馆的中央。舞台上云集了当时大陆流行乐坛的百名精英，他们中间有周峰、常宽、毛阿敏、胡寅寅、成方圆、王迪、崔健、赵莉等一批当红歌手。

演唱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发行的专辑盒带，虽然A、B面只此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发行量仍过百万。一时间，中国大小城市，《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随处响起，人们开始习惯于微笑着聆听过去视为末流艺术的流行歌曲。

1986年5月9日，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节日将停留在世纪的日历里，已经习惯了低三下四、习惯了忍受拍拍打打的中国流行音乐，终于在《让世界充满爱》圣洁的歌声中树立起正面的形象。这个时期的前前后后，流行歌曲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截至目前的最高峰。

同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这次大奖赛首次将通俗唱法与美声、民族唱法分开评比，客观上等于正式承认和肯定了通俗唱法的存在。也是在1986年，中国音乐

家协会首次以肯定的姿态介入了全国第一届“孔雀杯”民族通俗歌曲大奖赛。

这两项大赛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决赛时，大城市让人有万人空巷之感，电视收视率高得出奇，掀起了社会的流行音乐热。几届大赛为大陆歌坛陆续推出了苏红、韦唯、刘欣如、毛阿敏、杭天琪、陈汝佳、屠洪刚等歌手，并推出《我多想唱》、《黄土高坡》等优秀歌曲。每次的比赛过后，获奖的歌手都会成为歌迷认同的歌星，大赛中的优秀曲目也被歌迷广泛地传唱。

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上，当崔健身着黄色军便服出现在观众面前，并按响手中的吉它时，人们知道，原来只属于西方的摇滚乐已经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中国歌坛。

我曾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脚下这地在走/耳边那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这首由崔健作词作曲的《一无所有》一经唱出，首先便在现场引起了强烈反响。演出结束以后，《一无所有》迅速传唱开来，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也许，对于中国的流行音乐来说，《一无所有》具有与《乡恋》同样的历史意义，它代表了中国流行音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代表了

中国流行音乐的现实性得到发展。同时，崔健也以自己的创作能力奠定了大陆第一个实力派歌星的地位，为以后的歌星发展属于自己的音乐，开了先河。

在《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结束之后，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公司和中国东方歌舞团分别推出盒带《一无所有》和《无名高地》，这两盒专辑收录了当时一些极富个性歌手的代表作，其中崔健的《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最后一枪》，王迪的《冲击波》、《不觉流水年长》，孙国庆的《山歌》、《无言》、王虹的《别为我送行》、田震的《最后的时刻》、王虹、常宽的《血染的风采》等歌曲，成为当时的畅销带。虽然盒带中很多曲目原创性只占一半（国内填词），但由于演唱歌手素质高，领会了流行音乐的真正含义，加之歌词内涵丰富，贴近人生，所以直至今日，这些歌手和曲目仍可认为是代表流行音乐在大陆的较高水准的。

这个时期，流行音乐的原创性很高，社会上，人们乐于谈论郭峰、陈哲在创作《让世界充满爱》时所表达出的才气，此外，以《无言》、《不觉流水年长》等歌曲为代表的词作者黄小茂、以及与陈哲密切合作的曲作者苏越，都成为当时流行乐坛的主力创作者，并屡有佳作推出，让歌迷广为传唱。同时崔健的出现，更使歌手自己作词作曲演奏这一模式不再遥远，使流行音乐在大陆极富生命力。

社会终以博大的爱心拥抱着流行音乐这个新生儿。过去灰暗的日子，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在本土创作者才力四射，歌者层出不穷的日子里，歌迷也格外热衷于

本土的旋律。《我多想唱》、《祈求》、《别为我送行》……在歌迷中不断传唱，原先十分抢手的港台歌曲似乎在一瞬间沦为附属的地位。

但是，这种辉煌，对于才诞生了六七年的大陆流行音乐来说，似乎来的过于早了点，我们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高水准，而掌声已经饱和。不过，在辉煌的日子里，似乎没有人考虑这些问题，大陆流行音乐像一个暴发户似的正在信心十足地炫耀着自己的财富。

辉煌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接着而来的将是什么样的日子？当时，没有人在想这些问题。从《信天游》到《黄土高坡》，大陆歌坛吹起“西北风”，如一针强心剂，使歌坛的辉煌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80年代中期，一个日本的男影星赢得了大陆千千万万人的喜爱和崇拜，由于对他的喜爱，竟使中国传统的男子汉形象受到一次冲击。他就是以面无表情著称，外看似铁，内看似水的硬汉高仓健。

从南到北，寻找男子汉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时间，面无表情成了中国男影星追寻的银幕形象，而过去曾红极一时的英俊小生，竟被戏称为“奶油小生”，在观众面前“抬不起头来”。

一股阳刚之气莫名其妙地在中国大陆升腾开来。

刚刚在辉煌之中赢得千万掌声的中国流行音乐，似乎很愿意居这般阳刚气之中继续扮演一个

主要的角色。于是，《让世界充满爱》以后，流行音乐的“西北风”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吹遍全国。

直至今日，仍有很多人把这股“西北风”的源头，看做是崔健的《一无所有》和刘志文、侯德健作词、解承强作曲的《信天游》。但令人惊异的是，对这种看法，无论是崔健还是解承强，都极力否认自己有意带动一股什么风向，一股什么潮流。

崔健的《一无所有》，运用了唢呐等民间乐器，作品整体充满着西北地域的音乐色彩，显得很有阳刚气。作为对过去充斥流行音乐中阴柔气的一种背离，《一无所有》使歌迷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亘古的沧桑。因而，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摹仿和追随。

“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改变/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

这首《信天游》的歌词，便让歌迷感受到西北风情，加上音乐风格的摇滚化，虽然作为成品收录在《程琳·1987》专辑中，但其阳刚之气仍是掩不住。

这两首歌很快在各种场合出现，成为人们十分熟悉的旋律。成功所带来的，是更多的人把眼光投向了塞外曾被冷落的西北。

1987年、1988年，歌坛吹起强大西北风，其间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陈哲、苏越的《黄土高坡》、张藜、徐沛东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热恋的故乡》等

等。

这两个年头，音像出版单位看准了“西北风”磁带的可观市场，想尽办法投靠“西北”，随便站到一个音带销售柜台前，首先进入人视线的满是“黄土”、“西北”、“乡土”、“西部”等字样，让人无从选择，哪一个才是正宗的西北风味。

“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向前走/莫回头……”这首《红高粱》的插曲似乎最能代表相当一部分的“西北”歌曲，歌词有无实际内涵已不重要，只要歌手的嗓音沙一些、底气足一些、配器摇滚一些、发泄的可能性大一些，这首歌的成功可能便拥有了一半。这就难怪，在演唱《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这首歌时，姜文和张艺谋还曾为争夺演唱权拼杀了半天。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大中城市，以“黄土”、“西北”、“红高粱”命名的演唱会此起彼伏，票价一涨再涨，演出仍然场场爆满。这个时期，演出中获得最广泛掌声的，是孙国庆、王迪、田震、腾格尔、范琳琳、刘欢这些大嗓门歌手。那些过去靠唱“温柔爱情歌”而发迹的歌手，在这种局面中，只剩下为“西北歌手”休息时填补演出空档而偶尔出现。

在这两年中，一些港台巨星已经远离歌坛，而正在港台风风光光的歌手，却因为“西北风”占据大陆流行音乐市场而迟迟不能登陆，人们似乎非常有理由为我们自己的作品取得了“胜利”而由衷的感到高兴和自豪。

过后，人们从各种角度评判这股来势汹涌的西北风。有人说，这股极具阳刚之气的西北风是对过去充斥歌坛的阴柔之气的一种背叛，代表人们的欣赏品位有所

提高。

有人说，这股风潮中的歌曲，最大特点是把流行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完美地结合，使“西洋品”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有人说，这和当时文坛的寻根热具有相同的动机。改革开放使世界变化出奇的快，人们在奔波中忘了从哪里来，也忘记了要去哪里，于是就产生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类的疑惑，因而，西北成为一种根的象征，被众多人在潜意识中去认真寻找。

还有人说，这两年天灾不断。大兴安岭火灾、南方水灾、“火车亲嘴，飞机打滚”，物价飞涨，一次又一次抢购出现在各个城市，人们在动荡不安的心情里需要一种发泄，一种放松的吼叫和嘶喊，而西北风正好迎合了这样一种心理。

无论人们是褒还是贬，以今

日的眼光回头去看，恐怕西北风对大陆歌坛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从创作上来说，西北风第一次让创作者开始寻找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的沟通。流行音乐不再单纯的是一种“外来品”，而具有了很多我们自己的风格。从这一点上来说，“西北风”为以后大陆歌坛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引导。

从流行音乐市场来说，风风火火的西北风吸引了更多的人成为流行音乐迷。根本不成熟的录音盒带出版刺激得迅速发展，而成今日的蓬勃发展之势，这一点，恐怕是当初投身“西北风”的人所没有想到的。

然而，西北风只吹了两年。这股风向过后，人们看到了天空中出现的“台风”迹象。

歌坛开始有些不安。

《红塔山和葡萄皮》是由田震等歌手主唱的一盒顺口溜式专辑。发财、个体户等内容出现在专辑内，歌词更是以大白话、民间俚语为主，这种无太大艺术意义的作品竟奇迹般的发行过百万。这期间，还有类似《麻坛新秀》、《大老爷们爱唱歌》之类的歌曲，也由于迎合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某种心理而挤进了畸形畅销的行列。

迟志强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名青年影员，曾经主演过《夕照街》等影片，属于影坛新秀这一级别。可惜的是，这位本应在电演界继续发展的年轻人因流氓罪入狱。没想到，出狱以后正赶上流行音乐风格缺乏，市场销售吃紧，于是，一些人打着迟志强的牌号，以他在狱中的生活经历为主题，推出迟志强专辑《悔恨的泪》，这盘“失足专辑”的发行量又奇迹般的突破百万，掀起了一股“囚歌”热。

上海的张行，在 80 年代初期，曾以《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专辑创下国内发行纪录，后因流氓罪同迟志强一样走进监狱。出狱之后，市场上似乎很流行有这样“失足经历”的歌手唱歌，于是，张行又风风光光地走进录音棚。

市场上，《悔恨的泪》、《铁窗泪》、《囚歌》之类的盒带十分走俏，导致流行音乐误入歧途，最后终于暴露出穷途末路的面目，为港台歌手再次大规模走入大陆，创造了最好的内部环境。

其实，“西北风”也好，“囚歌”也好，都同样显现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不成熟。《一无所有》一出现，《信天游》一走俏，全国四面八方都是“西北风”；《悔恨的泪》一出来，“囚歌”风便铺天盖地。这种一窝蜂现象说明了大

潮来潮往：却道作今不如昔

《从悔恨的泪》到《麻坛新秀》，流行歌曲在大陆变了味，俗、邪、土在短期内成了流行音乐的主流。过早辉煌的大陆流行音乐终于在这种畸形发展的打击下，露出先天不足的病弱面目。

风潮毕竟只是一种时尚，而

时尚往往是不会停留太久的。流行音乐在大陆的发展尚不足 10 年，创作人员的缺乏，使“西北风”经历了短期风光之后逐渐降温。到后期，西北一些民歌都被重新配器之后冒充“西北风”来蒙骗听众，“西北”、“黄土”之类的磁带开始出现在降价品的摊床上。

但钱还是要赚的，磁带还是要出的，流行音乐慢慢变了味，开始向“邪”、“俗”、“土”的方向发展。歌迷的心态也让人匪夷所思，一段时间内，竟以愉快的心情接纳了这些“残次品”。

大陆流行音乐的风格缺乏，品味单一。当各种风潮最初出现时，却暂时以新鲜感吸引了大批歌迷，但时间一长，各种音乐风格都被统一到“西北”、“囚歌”的范围里，终于使歌迷的胃口不堪负荷。而这个时候，贫乏的大陆流行音乐又无法再创造出新的风向来稳住歌迷，大陆流行乐坛出现了真空状态。

谁来填补这种真空？

此时港台的流行音乐已经完成了一次变革，过去仅仅“你情我爱”的内涵已向多元化内容发展，罗大佑、童安格、王杰等一批实力派歌手和谭咏麟、张国荣等偶像巨星一直等待时机闯入大陆。

现在，时机终于成熟。

当“西北风”降温，“囚歌”无力之时，大陆流行音乐工作者只好眼睁睁看着港台歌曲乘虚而入，开始在大陆歌迷心中“横行霸道”，大陆歌迷兴高采烈地成为港台流行音乐的俘虏。

大陆流行音乐发展的一个尴尬阶段：外来和尚会念经时期就这样悄悄开始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面对外来歌星的排挤，面对眼前伸手可待的金钱，一些歌手忘记了身上的责任，开始自拆舞台，阻挡前行的脚步。

当《让世界充满爱》献给了世界和平年以后，得宠的歌星们开始成为音像出版社、演出采访、晚会争夺的焦点人物，流行音乐逐渐开始成为一些人的发财手段。

由于巨额的报酬，歌星们当然乐于“被人利用”。神州大地，开始了明星大走穴。

A君，原属北京某歌舞团，属于不入流的乐手。前些年，由于业务不精，加之油腔滑调，因而颇不得人注意。怎料风水流转，发财的机会自寻上门来。

某一天，A君过去的同学找到他，问他是否可以通过平时圈内的关系网，“编织”出一台文艺演出的人员表来，好到外地演出几场，其中要有一两位当红歌星，其余可稍差，事后报酬可观。

A君心领神会，随之运用平日油腔滑调争来的关系网，收罗了大大小小八位流行歌手，连日奔赴外地演出。

结束之后，A君净赚2万。有了这一回，A君尝到了甜头，以后，他组织了多场演出。一年过后，A君开着自己的汽车奔波在各种演出之间，成了圈中知名度颇高的“穴头”。

像A君这样的穴头不断出现，明星走穴便成为一种时尚和必需，也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热门话题。唱一两首歌，歌手要价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歌手们开始忙碌起来，一场接一场的演出使歌手的时间显得非常宝贵。“赶场”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有时，一天赶上三四场也是常事。今天北京、明日广州，又过一日，歌手又出现在西安的舞台上，时间已被演出组织者拿捏的极其准确无误。

在这种紧张的赶场生活之中，歌星不断被“穴头”提高着身价。1989年1月27日的《中国音乐报》刊登了该报记者王荣起采写的一篇题为《关于1988年部分歌星走穴出场费不完全统计》的

报道，其中披露了以下这些数字。

毛阿敏	约2000元
刘欢	约1500元
韦唯	约1500元
孙国庆	约1000元
王迪	约1000元
田震	约1000元
胡月	约800元
杭天琪	约800元
王虹	约800元
苏红	约800元
那英	约600元
蔡国庆	约600元
屠洪刚	约600元
红豆	约600元
李勇	约600元
腾格尔	约600元
吴立坤	约600元
景岗山	约600元
范琳琳	约600元
王兰	约600元

又过了4年，到1992年底，大陆一线几位歌手的出场价全部超过5位数。歌星见面，已习惯于谈论是否购买别墅。估计一部分歌手的经济实力都已超过100万大关。

这些令普通百姓为之咋舌的数字，其实实在是保守的不能再保守了，可以说，这都是最低价。即使如此，天天有演出的红歌星们，究竟富裕到什么程度，人们自然可以很轻易地推算出来。天文般的数字让普通中国百姓难已接受，但现实的确如此，歌星们很快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们中的一员。“囚歌”风中尽风头的迟志强，虽然很少有人知道，《悔恨的泪》专辑并非出自他的歌喉，但他的腰包还是因此鼓胀起来。据国家税务局的一位权威人士透露，



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录制了70多个版本，不知刘欢唱没唱腻？

就是靠了这一盘盒带，迟志强收入9万多元。难怪有人开玩笑说，“要是知道这些，恐怕迟志强又会拥有一次坐牢的机会！”

歌星的暴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难以理解，一名歌手可以只唱一两首歌，便可以愉快地拿走一个普通人一年的收入。然而，这是一个现实。鉴于“民愤”太大，1988年11月30日，国务院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抵制高价演出 治理演出环境》这样一条消息：

“……大家认为，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首先，统一认识，统一步调，联合抵制‘高价演出’，使高价演员在全国的主要城市没有市场，刹住漫天要价的歪风。其次，对具有一定演出水平的演员，进行考核，确定等级，按级定价，制定‘演出费’的最高限价（每场500元），堵死哄抬演出费和漫天要价的漏洞……”

想法是好的，但这毕竟只是一份建议式的文件，似乎并没

有引起歌手和穴头们的重视。所谓的最高限价被轻易地突破，一涨再涨，到如今，个别歌手的出场费终于突破五位数。

歌手在走穴之中，换来了高档家用电器和高级私人汽车，有的甚至毫不客气的当上了百万富翁。然而，他们似乎不懂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名气和流行音乐在大陆来之不易的地位，偷税、逃税、误场等一系列问题被歌手们制造着。像成方圆误场，就曾被“中国青年报”以“没有规矩，何成方圆”的标题给予揭露。1993年初，广东歌坛的外来妹“打工仔”张咪和毛宁由于争唱《蓝蓝的天蓝蓝的梦》发生争执，结果张咪的男友郭大炜与毛宁在北京梅地亚宾馆大打出手，很让歌迷扫兴。而刘欢、毛阿敏偷漏税事件则更被人们熟知。

有一篇《明星大走穴》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刘欢逃税的情况。

以《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风靡中华的歌手刘欢，在成名之后成为“穴头”争抢的对象。

于是，刘欢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各种演出。

虽然每场演出他都可以拿到高额的演出费，但他从不主动向税务部门申报自己的演出收入情况。北京市税务人员十余次登门询问，要求刘欢依法交纳应上缴的税款，而刘欢每次都以“我不知道税务所在哪儿”为由搪塞、推诿。

直到1989年2月下旬，文化部、国家税务局新闻发言人就演员收入要依法纳税问题发表讲话后，刘欢才勉强来到税务所，询问纳税问题，税务人员首先肯定了其态度有所转变，又要求他在一周内将个人演出收入申报上来。

然而，时过很久，刘欢仍没露面，是有意拖延，还是健忘，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毛阿敏偷漏税事件同刘欢比起来，影响则要大的多。这被穴头定价最高的女歌星，被偷漏税事件打击很大。毛阿敏曾经在她自己著的《人生舞台》一书中，对这次偷漏税事件予以了详尽叙述。

有一次，毛阿敏到哈尔滨演出，时值春节，演出结束之后，当地一家报纸刊出这样一则消息：“以一部电影《疯狂歌女》在全国走红的著名歌星毛阿敏，春节到哈‘走穴’，5天获利6万元。当税务部门欲征税时，她却匆匆离哈，偷漏个人调节税3万多元。”

这条消息刊出之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毛阿敏的个人形象即刻从峰顶跌至谷底。后来，毛阿敏回忆这件事时，承认自己吃了法盲的亏，并且过于轻信“穴头”，而且对税务部门隐瞒了实情，说了假话。



毛阿敏在哈尔滨的阿沟歌晚会上，使她名声大噪，更让人认识到红透天的歌星也是人。

偷漏税事件的不断出现，素质的高低不齐，加上一些花边新闻慢慢破坏着大陆歌星们的形象。可眼前伸手可得的大把钞票，又难以使歌手们停下来思考一下。曾经有一篇文章，详细地披露了刘欢“忙碌”时一天的日程表：

成功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记者、崇拜者、演出组织者、音像公司的代表、穴头，蜂拥而至。1988年1月到4月间，是他最忙的一段日子，“只有半条命是我自己的”。一天，他上午在一个录音棚里录3首歌，然后再回到另一个录音棚里录两首，跟着又去参加一场晚会，上台前的间隙，还有人缠着他谈演出。一唱完，他立刻“打的”回家，谁知，后面竟一路跟来4辆车。门卫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急着忙慌地去关铁门。原来，其中3辆车上的人员是来谈演出的，一辅车又硬是把疲惫不堪的刘欢拖到了录音棚，直折腾到凌晨3点，他才被送回去，人却在车上睡着了。

这样的紧张，恐怕刘欢没有

时间可以坐到乐器的跟前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旋律，也无法静下心来，留住心中人生的感受。

也许是是没有歌手愿意抵挡诱惑，也许是“穴头催的太急”，歌手无法停下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其实，有很多歌手也是被迫推上了这样的境地，自己再也无法把握自己。曾经有一次，笔者和歌手解晓东有过如下的对话——

笔者：你现在在北京没有立足于哪一个单位，而且你现在演出活动很多，日程安排的非常满，那么你作为一个歌手，觉得这种忙碌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解晓东：作为一名歌手很难，怎样把握住自己，才能不被这种一时的忙碌冲昏头脑？

忙碌有时是一件好事，但有时不一定是好事。在我以前的时候，我感觉经常有一些时间可以属于自己，可以有很多想法，有很多可以展现自我的时候，也可以想想我这一段时间都做了些什么，我这一段有了哪些提高等等。但处于现在这种非常忙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没有这样的时间

啦，好像跟以前比我是两个人，也换了两个环境。所以现在有时候，我经常有一种失落感，整天尽管在忙碌之中，也经常感觉到空虚。所以我希望现在能有一段时间，去想怎样在忙碌中提高自己，为以后打下好的基础。

但是歌星们毕竟太忙了，他们要应付歌迷们大得可怕的胃口，他们要跟上稍纵即逝的风潮，西北风中要喊破嗓子，因歌声中要心酸落泪，同时，歌手还要把握住自己拥有名声的黄金时刻。结果，一股又一股风潮过后，歌手们突然发现，本土自创的歌曲变得极其稀少，加之港台引进版磁带开始登陆，歌手们重新走上了摹仿的道路。

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走俏大陆，屠洪刚马上跟上热潮，立即表示“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又过了些日子，王杰开始走红，屠洪刚摇身一变，叹道《一场游戏一场梦》；苏芮《跟着感觉走》在1988年成为家喻户晓的曲目，那英便靠这首歌杀将出来。也真难为了那英，一张嘴，歌迷很难辨别真假……能捞钱便先捞钱，身边的演出那么多，现成的港台歌曲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这种短期效应左右了大陆歌坛，一时间，歌迷对歌手的评价不再是以好与不好，而变成了“学的真像那个谁！”

没过多久，一些港台歌手开始慢慢在大陆亮相。歌迷们发现假的毕竟不是真的，虽然有的时候，假的唱起来也并非真的不是那么回事，但还是“原汁原味”更加刺激。歌迷们跳槽了，愉快地和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歌手说声再见便不见踪影。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大陆的歌手由于没有良好的素质慢慢败下阵来。身价一跌再跌，终于到了无人问津的“悲惨世界”。

从大陆到英国，从香港到日本，实力派歌手开始卧薪尝胆，只求它日东山再起，空荡的歌坛让给了“年轻一代”，让给了偶像派，让给了“外来之星。”

面对外来之星的凶猛气势，大陆流行歌手阵营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有长远眼光的歌手，开始认识到忙碌的危害，认识到“应付外来强敌”必须靠提高自身素质。于是，一些歌手自觉地从幕前走到幕后，或者远走国外，或者甘于寂寞，开始重新塑造自己。

在大陆歌手中，孙国庆的素质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这名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在自己当红之时，宣布暂时退出歌坛。理由很简单：“我需要自己的音乐”。退出之后，这名昔日被“穴头”争抢的“压轴歌手”果真很久不再露面，只是在1991年，家乡安徽遭受洪水袭击之时，这位歌手才以自己创作的歌曲出现在赈灾义演的晚会上。士别三日，水准自然令人刮目相看。

到了1992年，孙国庆重新走上舞台。然而，创作再次把他放在等待机会这样一个位置。

王迪，拥有中国男歌手中最富个性的嗓音。电影《顽主》主题歌《忧心忡忡者说》的作曲和演唱便是王迪，其才气自然被人目睹，然而，面对外来歌手的冲击和自

创作品的稀少，王迪退回幕后，干起旅游音像公司的美编，努力发展摄影的爱好。但是，细心的人发现，王迪依旧钟情于流行音乐，并且极其刻苦。京城音乐演出，只要涉及流行音乐，王迪每场均不放过，借鉴、学习、思考，期冀以高水准“重归故里。”

田震，这位最富个性和实力的摇滚型女歌手，在缺乏可供自己演唱的作品之后，同样让歌迷难以寻找。这期间，她先赴日本整容，后闲居在家饲养猫狗，朋友来家，只以烹调继续显示才华。但她的心中，寻找的只是属于自己的音乐，如若没有，绝不降低水准，以媚舞台。

周峰，一个曾经大红大紫的歌手，在名气日渐衰退之时，他远走英国，去流行音乐故乡索取真经。1989年，他果然汇集英国流行音乐好手，回国推出专辑《十亿皇帝》，水准之高，令人感叹，怎奈时值“外来之星”冲击大陆，专辑未有太大反响。

此外，还有胡寅寅远走日本；王虹活跃在香港。而在国内的崔健，也因为种种原因，时隐时现，让歌迷难以把握。

这些从辉煌掌声中退出的歌手，基本上属于极富个性，素质很高的实力派歌星。让他们退出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一是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给歌手带来了厌倦感，素质无法提高；二是认识到提高自己素质、超越自己寻找自己的作品的重要性。

无疑，他们不会真的退出流行音乐舞台。出于他们对流行音乐的把握，和才华的不断提高，我们有理由期待，有朝一日，他们的“卷土重来”，必是不同凡响。即使有些歌手不再回归，这种甘于寂

寞，宁可被人遗忘也不愿媚俗的精神，也应当引起更多歌手的思考。

果真，到了1992年这其中的几位歌头重行抛头露面，孙国庆把中央电台春节晚会的主题歌《中国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王迪成了很有实力的制作人，王朔作词的盒带中，主题歌便是由王迪唱的《玩的就是心跳》。而以新形象出现的田震，依然深深吸引着北京歌迷，1993年3月，走上阔别了六年的首都体育馆，面对北京怀念她的歌迷，这位实力歌手泪洒舞台。值得庆幸的是，实力，使她很容易便能在歌迷心中占有位置。

实力派歌手的退出，把空空荡荡的国内舞台让给了新生代，让给了偶像派。舞台上，歌手一个比一个漂亮，歌曲越来越甜，越来越远离生活。然而此时，大陆已没有多少目光继续停留在他们的身上，歌迷们关心的，是台湾、香港的排行榜，是台湾、香港的“巨星”们。

于是，大陆的流行音乐仅仅在一台台电视晚会中生存着，磁带市场交给了引进版，演出日渐稀少。因此，歌手们想的更多的是怎样挤进中央电视台的各种晚会之中，希望一夜成名。

在这种局面中，歌手们依然很忙，他们需要奔波在各种高级饭店之间，为“大款”们歌唱、流行音乐又成为少部分人的奢侈品，而歌手们似乎也以此为乐。

大陆的流行音乐一片沉默，没有多少浪花泛起，似乎重新回到了“史前状态”。

议论纷纷而起。

有人认为，大陆流行音乐跌跌撞撞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各种

风潮，如今的宁静正表明了一种成熟，是一种转型时期。歌手韦唯对此提出，歌坛存在危机，我不认为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发展陷入了停滞，我们的歌坛正经历着新的转型期。

还有人认为，这段沉默代表一种危机，并会持续一段时间。如何走出这种流行音乐的危机，关键在于歌手和创作者。同时，社会新闻界的作用是明显的，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如何发展，似乎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正所谓，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现如今，死亡似乎遥远。于是，我们等待新的辉煌在沉默中爆发。

从《命运不是辘轳》到《共有的家园》，歌坛宁静时期不断出现亮点，让人感受到流行音乐发展的脉搏，虽然短促，然而有力。

流行音乐重新在大陆回到“史前状态”，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人们似乎更多地感叹港台流行音乐实力的强劲，而忽略了我们的发展毕竟短短数年。

这次重回“史前状态”，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如今，流行音乐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保持宁静，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这段时期，大陆流行音乐依然执著地释放能量，无论歌手还是创作者，都在前行，只是脚步被港台冲击波所掩盖，引不起太多人的注意而已。

青年人依旧把成为歌星当成自己生命中的一个目标。歌手闯天下日渐时兴，安徽解晓东、解晓东兄弟闯京城的大获成功，更加

刺激了歌手的飘荡。如今，北上京城，南下广州、深圳，成为一些歌手的成名路线，经济目标固然是一个原因，然而，对流行音乐的狂热喜爱，才最终使他们把赌注押在闯荡之上，以孤独和漂泊寻求梦想的实现。而这种悲苦的经历，又将为他们心中的流行音乐谱进新的人生感受。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力量。

张藜和徐沛东的高水准合作，是歌坛宁静时期一个非常巨大的亮点，《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亚洲雄风》、《命运不是辘轳》等一大批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歌曲的知名度不亚于台湾金曲，其中以张藜的歌词最为影响深远，痛苦的经历和勤奋的品质加之与徐沛东一老一少的合作，使他的歌词真正触摸到流行音乐的精华部分，一句句大白话蕴含着让人思索的哲理，叫歌迷久久不能忘怀。

有一些歌手，开始推出自己的作品，引起了歌迷的注意。

屠洪刚，这名昔日谁红学谁的歌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感觉。1992年，他推出全部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专辑《感觉自己》，虽然词曲尚显稚嫩，但作为他的第一次冲击，实力不容忽视。

张伟进以一个新人的形象杀入流行歌坛，一出手便是不凡。这名集作词、作曲、配器、录音、演唱为一体的歌手，在晚会舞台上忽隐忽现。然而，《就要走远了》、《山的故事》、《留下我的心》等独家曲目，显露了他的实力，成为歌坛新的希望。

毛阿敏在经历了感情变故以后，形象向成熟发展，并且努力个性化，一曲《悠悠岁月》唱得令人

回肠荡气，实力大大高于以往。那英在“抛掉苏芮”以后，成为进步最大的歌手。她似乎真正寻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无论台风还是唱歌时的力度都拿捏得十分出色，欲成大家，只待时机。

天津的谢津，年岁尚小，可《亚洲的太阳》却被她演绎得十分火爆，强大的实力，使齐秦、齐豫姐弟来北京演出之时，特意跑到天津邀请谢津出山同场合作。

此外，还有侯牧人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广东流行音乐的创作实力等等日渐增高，都为不景气的大陆流行歌坛注入了稍许活力。

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遭受水灾侵袭，流行音乐再展爱心一片。香港、台湾等地，流行音乐均做出重大贡献。其中香港举行的“演义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最为引人注目，义演历时3个半小时，共募得港币10072万元，全世界有27亿人收看了这场演出的转播。

大陆流行音乐界的表现也深得人心。水灾初始，流行音乐界便汇集多名红歌星进棚义务录音，推出专辑盒带以利赈灾。刘欢与韦唯忙前忙后，终于筹办出大陆流行音乐界最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型义演——《共有的家园》文艺晚会，这台晚会甚至请出了好久未露面的孙国庆、田震等人。当歌手齐声高唱韦唯、刘欢创作的主题歌《共有的家园》时，歌迷兴奋地发现，流行音乐并没有倒下。

重新辉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摇滚乐的突飞猛进似乎是大陆流行音乐走出低谷的一个前奏曲。

进入90年代，大陆摇滚乐队